



#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SELECTED WORK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

# 中国民俗史 (隋唐卷)

主编 钟敬文 副主编 萧放  
韩养民 李志慧 郭兴文 李颖科 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SELECTED WORK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

# 中国民俗史 (隋唐卷)

主编 钟敬文 副主编 萧放  
韩养民 李志慧 郭兴文 李颖科 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于宏雷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吴海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史(隋唐卷)/钟敬文主编 韩养民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01 - 006579 - 3

I. 中… II. ①钟…②韩… III. 风俗习惯史 - 中国 - 隋唐时代

IV.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845 号

### 中国民俗史(隋唐卷)

ZHONGGUO MINSUSHI

主编 钟敬文 副主编 萧 放  
韩养民 李志慧 郭兴文 李颖科 等著

人 人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37.5 插页: 5  
字数: 596 千字 印数: 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6579 - 3 定价: 8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 总序

## 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

钟敬文

治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首先要熟悉民俗学本身的知识。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关于民俗现象的知识，用书本上的术语讲，叫民俗志，或田野作业资料。田野资料要靠学者自己亲身下去考察获得。你研究民俗，就得首先要熟悉你的对象本身。现在有些民俗学专业的师生对民俗知识本身都不大了解，或理解得不大正确，那就不容易搞好学问。比方说，搞文艺学，有些同志对文学知识不大了解，就去看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的书籍去摸索，这虽然不是很坏的办法，但终究不会有很大的收获。你总得对文学作品本身比较熟悉，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从事学术研究，这是常识性的步骤，是不可逾越的。我是搞民俗学的，我要了解我的一个博士生，我可以听他的同学、朋友做介绍，也可以同他本人打交道，我就主张一定要同他本人打交道，同时也听取其他人的看法，作为参考。我和他本人打交道，等到彼此熟悉了，就不仅知道他的样子、行动，还知道他的心理活动，我有了我自己的体会，这种认识同道听途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参考别人的意见，所获得的认识就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学问尤其如此。别人写的史书和理论书，绝不能代替你的实际知识，再好的理论也不能抵消学者本身对第一手资料的认识，这是肯定的。一个人学问的最主要来源，就在于他所研究的对象材料的本身。

过去本专业有些博士生走了些冤枉路，到毕业时要扭转，已经来不及了。我当导师的，事后回想，感到没有尽到责任，应该从一开始就不迁就他，制止他的做法，才能使他有较大的进步。

对民俗知识的获得，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别人的记录得到，用我们的行话讲，叫使用民俗志。民俗志，是其他学者考察当地各种民俗所做的记述，分单一民俗志和综合民俗志等多种，我以前写文章讲过。你们将来在学问上能有多大的成就，在于能否掌握足够的民俗志资料，这是关键性的；或者说是决定性的。第二条是学习必要的理论知识。博士生，还有访问学者，初进门，都要读一些“入门”、“概论”之类的理论书，对民俗科学有个宏观的了解。至于里面的许多房子，房子里面还有许多人，那等进了门之后，再借助其他的理论著作，直接或间接地去深入探访。专门性的著作，与概论性的著作相比，在门类上要齐全一点，内容也要深刻一点，不过它们既然是专项研究，就有它们的特殊背景和特殊的局限性，这点也要注意。比如，我国传统的民俗研究大多侧重在婚丧嫁娶和民间文学两个方面，其中婚丧嫁娶是讲人生仪礼的，也叫生活制度，专门的著作不少，但用婚丧嫁娶来概括民俗事象，并不完全，诞生礼就没有讲。再比如民间文学，在《民俗学概论》中，介绍了民间散文和民间韵文，分成两章<sup>①</sup>，篇幅已经不少了，可是也不全，还有史诗等重要内容没讲<sup>②</sup>。此外，中国有五十几个民族，各有不同的民间文学，相互之间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是大学问，也没有仔细地讨论，可是作为一本概论书，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结果还是概而不全。由此大家可以知道，任何专门的研究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和忽略点，这是在学习时应该事先知道的。初学时，可针对某个专题去读书，面窄一点也不要紧，但对面上的那些重要著作一定要知道，对整体理论信息一定要关心。与掌握第一手资料相比，学习理论是相当重要的途径，但不是

---

<sup>①</sup> 参见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9章《民间口头文学》（上）、第10章《民间口头文学》（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40—269、270—297页。

<sup>②</sup> 为开拓史诗研究的新领域，在钟敬文教授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蒙古族博士生陈岗龙和朝戈金先后撰写了这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在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补充修改出书，参见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陈岗龙：《蒙古古思故事论》（原博士论文题目《东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一切，不能涵盖资料的功能。

第三个方面的知识，是历史知识。民俗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人类有几十万年的历史，有民俗也可能几万年，文字记录才几千年。不管怎样，民俗的发生是很久远的，从人脱离低级动物起，就有民俗。民俗不是别的东西，是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人和事，加上有关的思维。我们无法知道古代民俗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但文字记录能够帮助我们略加了解，所以那些用文字记录的民俗文献是很宝贵的。

记录民俗的文献，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历史上的民俗现象、民俗活动和民俗事件记录下来，用科学史的语言讲，这种文献就是民俗史。所谓史，就是古人的记录文字；而前面讲的民俗志，是现在的记录文字。史与志，有时间上的区分。我们要熟悉民俗知识，首先要熟悉“志”；对于历史上的民俗知识的了解，就要靠“史”了。记录民俗史料的著作，历史上零零碎碎地流传下来一些，像《山海经》、《风土记》、《风俗通义》和《荆楚岁时记》等，旧版本也还不少，现代翻印的也有，比较容易找到，大家应该留心去看。一个中国民俗学者假如连中国民俗史的典籍还都没有看，那就不像话了，那就不是中国学者。倘若是一个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民俗，他不懂一两本中国民俗史的著作，是可以原谅的，尽管照道理他也应该涉猎，可是中国民俗学者没看过《山海经》和《风土记》就说不过去了，那证明你对应该具有的知识却没有。另一种情况是，历代古人对民俗现象进行理论思考的言论或相关著述，这种专著并不多，但断断续续的言论一直有，从先秦诸子起发表见解，到晚清时续有言论出现。整本的书太少，即便有，也是混合着民俗现象一起谈的，比如《风俗通义》，就既记录了民俗现象，也夹杂了作者的议论言谈，两者都有。现在也还有人编写民俗史，有的还没有写完。已出版的现代学者撰写的民俗史著作，像张紫晨的《中国民俗学史》和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史》<sup>①</sup>，我们图书馆里有，大家都应该看一看，是比较侧重资料的。外国人也写过，如日本学者直江广治就写过《中国民俗学》，中文本译成《中国民俗文化》<sup>②</sup>，我看了一下，有些地方不是很全，但还是他

<sup>①</sup> 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

<sup>②</sup> [日]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王建朗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自己的看法吧，也可以参考。其他还有一些外文的论文，都比较短，也可以找来看看。做研究生的，要尽可能地多看一些。

西方理论著作也要阅读，要学习世界上所有先进人文科学的成果。但是，一个中国民俗学者更要熟知中国的民俗史，熟知历史上前人的著作。中国民俗史著作中的思想观念与西方理论的相比，会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总的来说，在对中国民俗的记录和感受上，中国人毕竟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它也可能不都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但是子不嫌母丑，我们应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遗产。年轻人对这个问题不容易一下子想得很清楚，不过作为中国民俗学者，是必须思考这一点的。至于一些学术史问题，如古人所记录的民俗事象在现代生活中是什么形态？它们对于我们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长期发展的长期发展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些还都是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也许有的同学因为对某些现实社会现象不满意，所以认为母丑，感到西方的东西什么都好，可是你知道中国旧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吗？你对中国两个社会的情况做过对比吗？因此要知道历史，才会得出真知灼见。民俗学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人文现象是有自己的出生地的，绝不是风中的蒲公英，没有根须。现代社会强调高科技，但也不能忽视民族的人文文化。博士生是国家培养的最高级别的专业人才，在这些地方，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大家要明白，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我们应该对学习历史有自觉的要求。

大家除了学习民俗学本身的知识，还要学习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更好地认识民俗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并从这个层次上认识民俗学的性质和作用，这就是我常说的，知识结构要完整。造房子，打地基，地基越深越好，中国学问过去是很讲究基础的，现在也应该是这样。有些人只管民俗学，对其他学科想绕过去，缺乏相关的知识也不去管它，这是要自食其果的。以下谈民俗学和几个主要相关学科的关系。

民俗学与文化学和社会学。现在国家把民俗学放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面，不一定很科学，不过也有道理。因为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看，社会文化中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包括在它里面了。但社会文化内部也有差别，可以分成上、中、下三层，民俗学主要研究中、下层文化。有些人弄不大清楚，认为民俗不算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持狭义说的。其实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

义的分别，广义的文化应包括人出生后所学习的所有知识，人类学、社会学都是取广义说的，民俗学也取广义说。过去有些国家的学者，如德国学者，不是采用广义文化观的，他们所说的文化，都是指上层文化，如上层的文学、艺术等。最近张岱年先生主编了一本《中国文化概论》<sup>①</sup>，是教育部的指定教材，也只讲上层文化。他是哲学家，很有学问，但思维方式与民俗学者不同，大家可以各搞各的。一般现代人的文化观都比较狭窄，可在应用上又相当广，什么荔枝文化、风筝文化、龙舟文化、啤酒文化、西瓜文化、电脑文化都有。中国民俗学者取广义的文化观，即承认上层文化，但主要研究中下层民俗文化。李太白、关汉卿都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创造者，但都是上层文学家，就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畴。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书，总结我国建国 50 年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成就，我们编了一本《中国民间传承文化学论文选》，就把“民俗”、“传承”和“文化”几个词都放在题目里面了。

民俗学的基础是社会史，这一点，我没看见哪个外国学者讲过，我自己认为是这样，所以，民俗学的基础科学应该是社会学与社会学史，以及文化学与文化学史。过去，我们把民间文学的基础科学视为文学和文学史，以及文艺学和文艺学史，现在已经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地基上面了，属于社会学里面的学科了，对它的基础科学的认识也要调整。

在“学”和“史”之间，“学”是逻辑的、理论的，“史”是具体的、现象的，两者密切相关，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刚才提到的民俗学两组基础学科：社会学与社会学史、文化学与文化学史，每组都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各有其领域。研究民俗史和民俗学史，要离开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记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们是民俗学科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基础部分。我们的重点是研究底层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它们过去往往是被忽略的。

民俗学与人类学。另外一些学科，如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也是我们的友军。英国人管它叫社会人类学，美国人叫文化人类学，叫法也不一样。林耀华先生一开口就说，民俗学就是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人类学，这是他的看法。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用民俗学或民族志来代替它的。这些学术上

<sup>①</sup>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

的细微争论，我们就不去管它了。民俗学在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不同，各有各的特点，在中国还比较发达。我很想找一个人来北师大教文化人类学，一直没找到。有一次，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来这里讲学，他的一个美国学生当翻译。从邓迪斯说的经历看，他的运气还没有我们好，他不能在民俗学科里招生，只能在人类学名下招生，在他那里，民俗学还是人类学里面的一个学科，他的学生提出来我们这里读博士，研究民谣，我就想请这个学生教一点文化人类学的课，但此人的汉语不行，需要补汉语。我就对他说在中国补也行，回美国补也行，此人就回美国了，以后在美国读了博士，省事了，也不能来中国教书了。还有一个人，是外语系毕业的，英文不错，从外文书里凑了一些资料，编了一本讲义，是“文化人类学”，他本人也很高兴来这里教书，我看也还可以，写作的中文也还通顺，反正我们教这门课也是从无到有，但碍于客观原因，这个人没有被批准，事情也就放下了，现在这门课还是由董博士来教。人类学与民俗学的一些领域是交叉的，但这两个学科毕竟不同，不能完全混淆起来，所以民俗学者还需要了解人类学的知识。

民俗学与考古学。考古学这门学科研究历史上的文化，特别是史前人类文化。史前考古学发掘的文化还没有分化，具有全民性，早期民俗的分别也不是很大，看不见上、下层的差异，只有部落或氏族的生活，其文化是整体的。人类进入历史社会后，已有上、下层文化的区别，历史考古学的发掘就有了阶级层次的区别，比如：在马王堆的出土文物中，有许多殉葬品为上层阶级所有；但里面还有帛画，帛画上有神话，就是老百姓的下层文化。

但是，民俗民间文学不等于原始文化。这一点，我过去受了早期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也不大清楚，近年我写了文章，重新谈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后来读了很多史前文化的书，在思想上产生了变化，感到民俗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化两者，关系相对地密切，也有相对地区分，不能混淆在一起<sup>①</sup>。现在有些学者还在重复我过去的老路，把两者同等看待，妨碍了自己的眼力，当然这也难怪他们。所以我感到，民俗学者一定要学点考古学的知识。

---

<sup>①</sup> 钟敬文：《我与中国民俗学》，载张世林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48—49页。

民俗学与宗教学、语言学。搞民俗学，不能不懂得宗教学，两者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语言，是民俗的载体，在民俗学的研究上，语言学一直是很重要的。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甚至认为，研究民俗应该从研究语言入手，他的《蜗牛考》就是从语言学进入的。在我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语言学著作是专门研究底层文化语言的。美国的语言学家萨匹尔 (E. Sapir) 就做过这样的工作，我看现在翻译过来的他的书，还是他的一般著作，不是他的这类专门著作，能有这样的著作更好。我记得在日本时，有一个日本学者，是受法国教育的，搞语言社会学，已经很接近我所说的那种底层语言学。我国语言学者陈原先生也是搞社会语言学的，但他不是专门注意底层文化的，是搞一般性的社会语言研究的，不过陈老的书也可以参考。所以，对语言学和语言学史，也要有一定的知识。明年有一个毕业的同学研究家乡的方言民俗，就是一种新的工作<sup>①</sup>。将来如果能有人能写出一本《从〈说文解字〉看古代民俗》的博士论文，那一定会是一种很好的学术建设。

民俗学与地理学。民俗学和地理学也有关系，听说有人写了民俗地理学，很有意思。

以上讲了不少民俗学本身的知识及其与相关学科关系的知识，但这不等于说，民间文艺学就无关紧要了。民间文艺学始终是民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班女士的书中，曾把民俗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信仰，第二部分是社会组织，第三部分就是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sup>②</sup>。在很多国家，民俗学的兴起都是从民间文艺学开始的，我国也是从《歌谣》周刊活动开始的。从我个人来讲，我的专业也还在民间文艺学的方面。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比较复杂了，像今年毕业的五个博士生，有的研究社会组织、有的研究农具、有的研究信仰民俗，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但民间文学依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例如，凡是中文系毕业的同学，对文艺学的发展会了解得更多一些，他们会注意到，当前文艺学界很注重使用叙述学理论、话语理论等新学说，其实这些都是同我们的关系很近的。更重要

<sup>①</sup> 后此文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再经补充修改出版，参见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

<sup>②</sup> 班女士，亦译为班尼、班恩、博尔尼，其著作参见〔英〕查·索博尔尼 (Char Lotte Sophia Burne)：《民俗学手册》，程德琪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的是，民间文艺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民众的情感产物，而一般人文社会科学都研究理性的产物，这是一个主要的差别。其实，人类理性地思考问题的比率还占少数，大多是从风俗习惯出发的，过去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没有多加思考。也有时是从情感出发的，所谓不要感情用事，就是指感情对行为的支配作用。实际上，一个人没有感情，就没有家庭、没有朋友，那不成了木头了？很多人做出英雄行为是为了感情，很多人做出坏事也是为了感情，不管怎样，人是离不开感情的高级动物，而人的感情是要社会化的，问题是看怎么控制它的界限。我不是学心理学的，不过我常常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心理学的著作，感到这种书能帮助我们提高专业的修养。严格地讲，人是理性加感情的动物，人的许多行为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是感情起作用的结果。我们按照传统行事，里面可能有理性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不好说都是理性在起作用。你问老百姓为什么吃粽子？他说我们的祖宗就这样吃啊，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再来看理性的哲学结晶之一——辩证法，很多同学可能从中学起就学辩证法，到大学还学，应该是接触得不少了。过去我教研究生，让他们每人读两本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sup>①</sup>，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sup>②</sup>，重点要求他们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从事学术研究，那时是很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的。后来转向了经济建设，领导上对意识形态不可能同时抓得很紧，学界的潮流也发生了变化，不大讲使用辩证法了。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七年里面，把意识形态搞过头了，也可能造成人们心理上的逆反。其实照我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于搞学术研究、对于指导人生选择、对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还是相当有效的，但不是唯一的。应该承认，其他有些理论也有助于我们对人类思维活动和客观世界的认识。从日常生活看，人也很复杂。实际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少按照辩证法去办事，大都是片面的、形而下的。少数学者学了辩证法，能在学术工作中使用，但在生活中也很难完全这么用。我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起就学辩证法，学到了晚年，也没有放弃，但现在回头想，说老实话，在我的头脑、

<sup>①</sup> 温济泽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1984 年。

<sup>②</sup> 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 年。

行动和现实思维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符合辩证法的？很难说。平时做文章的时候还勉强，有时连做文章也不大遵守这些规矩。这并不是说，辩证法不重要，它非常重要，我是说理性思考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很大，情感的产物还是占多数的，居上风地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文学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研究它的民间文艺学不可被轻视<sup>①</sup>，在钻研民俗史和民俗学史的时候，也不能不涉及它。

学习科学史，或者将来从事科学史的研究，要抓住两点：一是历史，历史就是事实；二是理论，理论就是逻辑，包括学术批评。批评就不是完全讲好话，也要指出对象所存在的局限、不足或错误。在民俗学上，我们说科学史，是简省的说法，全称应该是民俗学科学史，或者叫民俗学的科学思想史、理论史等。叫批评史比较窄，只强调批评的那一面。现在很多文学理论史都叫文学批评史，比较窄，至少叫评论史稍好一些。

初入门者，最好先从现代民俗史和民俗学史做起。最近上海出了一套“东方民俗学林”丛书，收了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黄石和我等几个人的集子，可以看看，里面记录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学术建设活动<sup>②</sup>，还有一些内容没有收入，留待以后再补。上海还出了一套“原始文化名著译丛”，里面有泰勒的《原始文化》和《人类学》、弗雷泽的《金枝》（精要）等<sup>③</sup>，都是在现代民俗学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外国书，也应该认真阅读。但这些都不是纯粹的民俗学史著作。外国的民俗学史著作，像班女

<sup>①</sup> 在钟敬文教授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有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研究民间文艺学题目并已出版专著，例如：程蔷：《中国民间识宝传说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万建中：《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商务印书馆，2001年。

<sup>②</sup> 东方民俗学林丛书，共6种，包括：吴平等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王文宝等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钱小柏编：《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涂石编：《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刘魁立：《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高洪兴编：《黄石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sup>③</sup> “原始文化名著译丛”共14种，刘魁立主编，其中〔英〕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ylor）：《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英〕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人类学》，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英〕詹·弗雷泽（J. G. Frazer）：《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刘魁立据1922年纽约英文版徐育新等译中译本《金枝》摘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士的《民俗学手册》，我们也翻译过，可是不多，以后还可以再翻译一些。如果需要，并且可能，有些旧译著也可以重新翻译。

我们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书单，大家可能都见到了，以后可以结合指定书目去学习；还给大家印发了一部分复印资料，都是从现代民俗学史上的其他一些学者的撰著中遴选出来的，这些也希望大家能认真阅读，目的帮助大家扩大眼界，补充认识，丰富思考面。我还拟了十几个思考题，也发给大家了。你们在读书之后，按照这个思考题，每人认定一二个题目，回去集中准备，写出读书报告，就是备课，然后在课堂上轮流发言。发言者要对某一段民俗史有总体的瞻顾，也对民俗学史上前人的看法拈出具体的要点（他们记录的事实，就不去说它了），同时还要对个人的理论收获做比较详细的陈述，与其他同学展开讨论。搞学问要精读经典书，泛读有原创性的专门著作，但不能过于庞杂，太庞杂了，人就停留在表面上，就浅薄，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白开水。严肃的科学史的做法，利于消化所学的知识，能提高理论概括能力，为撰写开题报告和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打下基础。<sup>①</sup>

中国有大量的古代民俗史料，对这批史料要重视，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要好好地研究。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家、哲学家的一些民俗见解的讨论，已有学者做过开辟工作，但还不够。对古典文学和古代思想史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对王充这个人做点研究。王充这个人不得了，他不仅是古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就是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史上也不得了，对他的著作，可以做一些笔记、卡片，以引起写作的兴趣。

在世界上，我国的民俗学已经落后了，到现在也没能完全赶上。你们这一代人条件好，应该争取缩小距离。现在，在中国搞民俗学，不但现实的和历史的条件都相当好，而且资料也很丰富，理论的底子也不算太坏，就是要有人去干，还要苦干。不苦干，再好的条件也发挥不了。

在我们开的书单中，有《山海经》、《论衡》这些古籍，一共二三十本吧，希望大家集中精力去看，这样在将来论文选题和写作时，至少会受到一些启发。有些同学已经选了别的研究课题，如研究物质文化等，也要读一点

<sup>①</sup> 近年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撰写的现代民俗学史方面的博士论文，如：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古书才好。凡有古文基础的同学，都应该留意古籍中的民俗和民俗思想。我希望每届都能有一个研究生做这方面的题目。

刚才讲过王充，其实汉代的名家不少，王充是东汉的，西汉有司马迁、郭璞等，整个汉代的民俗现象和相关的学术活动都值得注意。前几年，有人在山东大学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民俗学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sup>①</sup>，说法颇有些勉强，但汉代民俗现象是一个应该值得关注的领域，这没有问题。汉代学术的一个特点，是对先秦学术做了总结。当时社会已安定下来了，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汉代学术还有另一个特点，是产生了或流行了许多纬书，这些纬书唐以后失传了，后来清人又做了大量的清理工作，近年好像有人把清人辑录的纬书编辑出版了，有几百种，现在外面可以买得到，至少图书馆可以买一本。这种书的内容古古怪怪，但是同我们的专业有关，里面有不少好材料。当然不是叫大家都去做汉代的民俗史和民俗学史，但总要人去做。

现在谈谈选择民俗史和民俗学史做研究的几个条件：

一是题目。题目本身要有意义，例如，在古代民俗史和民俗学史上，汉代确实有意义，把汉代拿出来单独选题，把汉代民俗学史的成就表达出来，就是对中国民俗学史的一种贡献，也是对世界民俗学史的一种贡献。

二是材料。就是要看材料丰富不丰富，搜集材料方便不方便，因为研究生搜集材料只有一年多时间，所以对这点也要考虑，搜集汉代的材料，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有的题目工程太大，在博士生阶段就不能搞，大家只能做可能做到的事。

三是能力条件。要视个人能力而定，看看自己能不能打天下，能不能驾驭材料，有没有条件完成所选择的题目。

从这三个条件看，可能有的研究生同学能拿下这类题目，有的不能，这要实事求是。选择了这类题目的同学，也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具备了条件，还要有毅力的配合、理想目标的配合。

研究中国民俗史和民俗学史，要了解中国民俗史料的特点。中国古代著作涉及民俗，从著者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身记录民俗的，如《荆楚

---

<sup>①</sup> 张汉东：《论汉代中国民俗学的形成》，《民俗研究》1993年第2期。

《岁时记》、《风土记》；另一种是编纂的，如《玉烛宝典》、《岁时广记》，是类书性质的古代民俗志。也有的民俗史料不是以民俗志的形式出现的，像保存在子书或杂史里面的民俗史料，《吴越春秋》就是个例子，它不是民俗志，但里面有很多关于伍子胥的描写，是民间故事，是民俗史的研究对象。《晏子春秋》也属此类，在子书内。也有些民俗资料被保存在正史中，如《史记》，在它的“列传”部分有《刺客列传》，其中的“荆轲刺秦王”一节，就完全是民间故事。也许荆轲刺杀秦皇的案件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大家都传来传去，把想象的东西也带进去了，就形成了故事。司马迁这个人，史学造诣很高，也吸收了不少民俗资料，这可能跟他吃了苦有关系，所以吃苦对学者来讲不都是坏事。学者吃苦以后，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都会有所不同。司马迁的方法就和别人的不一样，他到地方群众中去搜集史料，天下名山大川他也都去过了。班固就没吃过那种苦，是书斋学者、宫廷学者。这些史籍都是重要的历史遗产，有的方面已有学者涉猎过，还有许多方面学者没有涉猎过，而在今后的民俗学史上需要涉猎，这些我们都应该搞出来。我们有了民俗学的专业知识，就能够发现它们和分辨它们；我们有了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知识，就能够帮助自己增加对当时社会历史的了解。

除古代的文人著者之外，大家对古代史料本身也要十分熟悉。做任何学问都要熟悉原始资料，原始材料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行动和客观思维，但要从事科学研究，还要把原始材料书面化，写成文字的记录，比如民间故事，要写成记录文本，否则就没法研究。在民俗学中，这种书面化的资料就是民俗志，上面已经提到过。古代民俗志不是为了研究而专门记录的，原来是为了保存和传播的，不过后人搞研究必须依靠它们。我们和古代文人学者的区别是，古人用古代文化观去看待周围的民俗，今人用现代文化观和民俗学的眼光去看待古代民俗文献，今人所从事的是现代民俗学的研究。

中国历来有文书的历史，五四以后把它的时间缩短了，认为应该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算起，也有的认为应从春秋时期出现正式的书面文书开始。后来考古学发展了，证明我国的文书历史起码有三千年以上，所以我们是文明古国。现在意大利、俄罗斯、英国、法国的文化史都很有名，但论文书的历史都不如我们。我国的历史长，地方大，民族也很多，文书资料十分丰富，跟海洋一样，清理这部分资料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使用文书史料，要有门径，门径即目录学和文献学，假如没有这个知识就很困难。我们写《民俗学概论》，是以论述现代民俗为主的，但也离不开古代的文献，因为哪一种民俗都有过去的历史，我们也要查阅相关的文献。其他单项的民俗描述也要交代历史，如写节日风俗，或写节日中的放风筝，不介绍它们的来历恐怕不行，那样就不能使民俗事象获得学术意义。写傩戏，也要追溯它的早期形态，比如《论语》中记载了孔子观乡人傩的事件，你也不能完全不管。当然两千多年来傩戏会有许多变化，可是不知道它的过去不行，那样就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怎样演变的，也就不知道它在今天的价值，所以现代民俗中有历史民俗，有些历史民俗影响到现代民俗。连“文献学”这个词也有变化，从前指历史资料，现在有了新解释，把现代资料也叫文献。总之，文献中有古代文献和现代文献。

我国民俗史料被保存在各种历史文献类目中，有的比较集中，如保存在经史子集中，或者在文学作品中。有的是散在的，如分散在《史记》、《汉书》里面，其中有汉族民俗，也有少数民族的民俗，这种书的“纪”、“志”、“列传”里面都有不少民俗资料。还有一种是专著，如上面提到的晋周处的《风土记》，这个书失传了，现在有辑佚本；还有隋代的《玉烛宝典》和宋代的《岁时广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中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类书，如四库全书，从事民俗史和民俗学史工作的人也需要查阅。杨树达先生就是把古书中有关汉代婚姻丧葬的资料勾稽出来，写了《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sup>①</sup>，做出了贡献。五四前后，胡朴安写了《中华全国风俗志》<sup>②</sup>，里面也有很多资料是古代文献，还有一些是从当时报刊上搜集来的资料，现在叫现代文献吧。

研究某一时代的民俗史料，就要知道这一时代有哪些书目涉及了民俗。要了解书目，就要利用书目提要。中国历代的书目提要大概有八种，但它们都是把各种书混编在一起的，并没有为民俗史料单编一个书目。你去翻检这些书目提要，就要善于把记录或谈论民俗的书抓出来，这是一个本事。我们有一个二年级的同学在研究《荆楚岁时记》，我对他说，你研究这个题目，

<sup>①</sup>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

<sup>②</sup>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

就不仅要知道《荆楚岁时记》的各种版本，还要大略知道自先秦以来各种有关岁时风俗的文献，后来他做了学年论文，就选了这方面的一些古籍做了一个书目，虽然还不算全，但算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工作<sup>①</sup>。在现代专业书目整理方面，四川的彭维金同志做了不少工作，撰写了一个书目<sup>②</sup>。现在这本书不大好买，不过图书馆还可能有。至于四库全书的书目提要，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你们是专门研究民俗学的，要看看这些书目。当然，只知道了书目，还只是门户；真正要进去，了解里面的学问，对书目的版本、源流、内容和流变等获得认识，才好做进一步的研究。

民俗学者除了进图书馆，还应该有自己的资料库，里面存放一些重要的书籍和与做论文有关的图书材料，将来可以从里面辑出一部分内容供写作论文使用。就是以后教书，也不能空讲理论，总得要有根有据。让你讲汉代民俗，那你得有《史记》、《汉书》方面的资料，还要有别的相关图书，是不是这样？

要勤于查阅工具书。这些年出了不少工具书，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我们不能说这些工具书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整个学术界也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但我们可以适当地利用这些资料。前几年，有人要编写中国风俗词典，要我当主编，我没有答应，道理很简单，里面的词条，你马马虎虎地写，也能很快地写上一二百条，但是科学根据呢？如果只是抄前人的记载就不行，因为前人不是民俗学家，没有现代学术训练，他只是把当时的人和当时的事情记下来而已，结果只能是一种历史资料；词典上的词条则是要教给人家科学知识的，两者的性质不同。中国风俗词典上有那么多词条，都要去做科学研究不大可能，现在的积累也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所以我当时没有答应，请他去找别人。别人的胆子大，勇气也大，就应承下来了。我这个人很小心。我觉得，在现在的条件下，谁来编也不行，包括我在内。别人愿意搞，当然也好，至少可以把原始资料搜集起来，为后人在他肩上再做提供了方便。我们就出生在现在这个环境中，如马克思所说，是在既定的舞台上活动的人，人不能选择舞台，舞台是已经摆好了的，人充任什么角色，基本上就

<sup>①</sup> 此文在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再经补充修改出版，参见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sup>②</sup> 老彭（彭维金）等编纂：《民间文学书目汇要》，重庆出版社，1988年。